

金基德電影對儒家道德律的挑戰

簡端良

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韓國導演金基德在 2003 到 2004 間的作品《春去春又來》、《空屋情人》、《援交天使》，三部電影，有一些讓我們無法理解的情節，挑戰了我們成長過程中被潛移默化的儒家道德律，如《春去春又來》這部充滿禪意的電影，小和尚與少女的偷情、老和尚的自焚……，《空屋情人》當中，私闖民宅行善佈施、誘拐他人老婆……，《援交天使》高中女學生援交，女女同性戀……，這些違反倫常的行為，金基德欲透過畫面直指人心，誘導觀眾反思、覺察。而傳統社會，儒家把生活與社會倫理歸納為一些道德條目，建立起「禮教」的社會結構，但也因此被視為型式主義，被批判為禮教殺人，本文以三部影片，對中國文化圈所慣用的儒家道德律提出挑戰，解構形式主義的道德規範，藉討論金基德的用心來省思何謂人性中真正的「善」。

關鍵字：

金基德、儒家、禮教、通識教育



一、前言

韓國導演金基德，是少見的鬼才導演，他在2003到2004間的作品，解構著儒家的道德精神，如《春去春又來》，處處充滿機鋒的禪宗意境，透過戲法直指人心，讓讀者在道德解構與建構之間反思，觸動讀者善的自覺；《空屋情人》，同樣地創造了強烈的道德衝突，向讀者質問道德所謂何物？其內容挑戰著法律原則與道德下限，反而擴張了道德的範圍；《援交天使》則以「援交」這個最受爭議的題裁，企圖把援交神聖化，進一步衝撞著道德的極限，逼著讀者進入「什麼是善？」的反思。

三部電影有一些共同的元素，如「不倫之戀」發生在僧侶、人妻、與同性之間，透過這些「不倫」對比倫理結構與道德規範的合理性，金基德用畫面挑戰著即成的道德價值，邀請我們再思考「什麼是善？」，對普遍道德一層又一層的質問、剝除，並非不是推崇道德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反而是藉無所住的禪意，來直指更高一層的善的意境。

「現代主義過分樂觀的以道德，科學與法律，所欲建立的人類價值之社會生活是如何的在金基德的電影中，被後現代社會情境給徹底幻滅。」¹本文所提出之普遍道德律的解構，並不等於去道德化（de-moralizing）的意思，「去道德化」指的是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中，提倡價值多元，以道德相對主義（moral relativism）為常態，因此不敢輕易論斷道德是非，並認定道德判斷是一種武斷、任意隨性的活動。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有不同的意見，判準完全以相對性為根據。這樣的理路，不是本文的脈絡，金基德的電影，雖用相對主義挑戰世俗的道德，卻不能說他就是個道德的相對主義者，因為在他去道德化的過程中，仍可看到禪法，明心見性為核心價值，覺悟應包含道德相對性，道德不僅要自律，自主，還多了自覺，也可說是最深度的自由。

以《春去春又來》而言，影片一開始，就有一個道德解構的意象：一扇門，片中的角色在門裏門外進進出出，來來去去，這道虛設的門，究竟代表什麼意義？「門」，在空間上，可以分隔「裏外」，但門一撤除，「裏外」一體，所以這個分別，是有條件下被需要，門是在什麼條件下被需要？社會運作這條下的必要，當人必須保持自己的「所有權」，建物必須有「裏外之分」，組織求效率而簡化為「階層」，社會圖方便運作衍生出「階級」，科舉制度下的「門檻」……一道道「門」無時無刻地隔絕著你我，就如寺院內，是清淨的「聖地」地，寺院外，是染濁的「娑婆」，「分別」、「妄想」、「執著」，分別好壞、是非、善惡、美醜、生死……。即使認知外物需要動「分別」心，讓空間分裏外，人心分俗聖、物理世界有淨染，可是真的有這麼一條聖與俗、淨染、俗聖的分界限？同樣的，「道德」與「不道德」之

¹ 邱察，〈金基德電影空屋情人中的後現代書寫與情境〉，《藝術研究學報》6卷2期（2013），頁39~56。



間，也這樣被制定出一套原則，就在念念的分別中，不斷被強化，強化的結果，形成體制與規範，用以維護我們心中習慣的判斷，形成了道德上的善惡，但《道德經》云：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體制讓道德僵化，讓人失去反思，拆掉這扇門，無內外、無分別，沒有好惡，沒有對立，善，在念念的直觀之中。

二、金基德電影對「禮」的解構

「禮」是封建時代全體生民共同的生活規範，李日章說：

西周的社會是一個很嚴謹、很秩序的一個社會。用以維持這一秩序的就是備受儒家尊崇的「禮」。禮是當時的生活規範，分封制、宗法制、井田制，乃至地方行政編制、軍隊編制，都屬於禮，但禮的內容猶不止於此，它還包含別的許多東西。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它至少含有現在所謂的國家法制、道德誠律與社會習俗等二大類的東西。²

雖然孔子也說過，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但「仁」所建構的道德誠律，社會習俗，讓儒家的道德成了封建的國家法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遵從，反而讓道德成為靜態的權威，而非動態辯證，因此，只有退步沒有進步，李日章說：有人說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禮壞樂崩」的時代……在孔子等人的眼中，這完全是人類墮落的結果，是一種退化的現象……事實正好相反，它乃是社會進步的結果。³

儒家文化在歷史發展的脈絡下，具有強烈的政治性格，意外地，又成了威權專制的保護傘，其所培育的君子素養，發展成為貴族文化。

這種道德伸張君權、父權、夫權、壓抑臣民、兒女、妻子，置他們於不對等的權利義務關係中，又特別強調家國等群體的價值，但其被給與的理據，在今天看來，並不足以令人信服；其提倡的實踐工夫，也問題多多。這樣的一種道德，顯然已很難被經過啟蒙且請求平等、自由、人權又尊重個體的現代人所接受。⁴

李日章要說的是，在平等、自由、人權這些原則上談道德，才有意義，但若是以「和諧」、「穩定」作為道德的目的，這樣的道德結構，是應被解構的。我們就舉《空屋情人》為例：他挑戰著儒家基本道德律，孔子教導的道德倫常：指示著：在君與臣之間必須要講究信義，在父與子之間必須要講究關愛，在夫與妻之間必須要注意他們在工作上的分工……在朋友之間必須要講究忠誠。這些格言建構出社會的一些基

² 李日章，《還原儒家 告別儒家》（台北：康德出版社，2008），頁 30。

³ 李日章，《還原儒家 告別儒家》（台北：康德出版社，2008），頁 36。

⁴ 李日章，《還原儒家 告別儒家》（台北：康德出版社，2008），頁 309。



本規範。但在《空屋情人》的影片中，女主角卻在父權主義的被宰制，喜怒哀樂仍著受到男性的命令。男尊女卑的社會階級觀念，女性被男性豢養在豪宅內，無條件的服從、忍受，就是女性的美德，犧牲就是家庭秩序的和諧與穩固的基礎。⁵這都是父權社會的道德觀而衍生出的不正義。

在《空屋情人》的故事主軸圍繞在「擅闖民宅」這個行動，這在禮運大同的世界，當然是不被允許的行動，但邱察用這樣的觀察，來分析男主角的心態

他想要逃脫現代主義對家所立法和教條化於禮教上的束縛，或是父母依循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所加諸於他的期望，也就是自我解放於這代表人類價值縮影「家」，所箝制於他的規範，因而藉由選擇在城市巡遊中，以非法侵入住屋的方式，自由的過著非由家的核心價值，所定義與約制化的智性生活。⁶

「擅闖民宅」在禮治、法治的社會中，都不會是道德的行動，但金基德卻提出了一個質疑，「是否有高於禮與法的道德之行動呢？」金基德用了他的想像，創造了相當多的情境，用以挑戰禮法的權威性。被兒女棄養的老人，在男女主角闖入意外地被發現，把老人安葬了，卻被法律制裁的情節，是對假仁假義最大的諷刺，把男女主角以起訴「小偷」之名起訴的人，包括兒女、警察，都是金基德暗喻的假道學；另一個對「家」最的意義，發出強烈的質疑的，就是豪宅內的緊張關係，空有夫婦之名，貌合神離的緊張關係，以和諧為原則的夫婦之道，壓抑著平等、自由與人權，金基德又再次挑戰儒家的這種倫常道德，直接用「擅闖民宅」這個行動，去救贖痛苦的靈魂，他提出的問題是，當倫常壓抑了人性，那救贖人性的不合法手段，是否可行？比如：屋內缺乏的「孝」與「愛」，那麼該譴責的是「不孝」或「無愛」，還是為每個家補起缺憾的違法者？或說，利他與佈施，能不能介入親情與愛情，在超乎正常人理性思考的範圍外被實現，即使那解構了傳統道德？

另一個更激進的例子，就是《援交天使》，這片提出的問題是「援交，為何不可以是聖潔的佈施？天使，難道不能以性來慰藉受苦的靈魂嗎？」這個衝擊儒家男女、君子……等倫常的概念，引自《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婆須密多女的故事，婆須密多女示現妓女身以欲度人，經云：

險難國寶莊嚴城婆須密多女，說離欲際法門。一切眾生隨類見我，我皆為其女像，見我者得歡喜三昧，共我語得無礙妙音三昧，執我手得詣諸佛刹三昧，共我宿者得解脫光明三昧，目視我者得寂靜法門，……住是離欲法門廣為利

⁵邱察，〈金基德電影空屋情人中的後現代書寫與情境〉，《藝術研究學報》6卷2期（2013），頁48。

⁶邱察，〈金基德電影空屋情人中的後現代書寫與情境〉，《藝術研究學報》6卷2期（2013），頁46。



益。此豈非逆順欲法門導利群品耶。⁷

片中兩名高中女學生，效尤婆須密多女的精神，不但不以援交為恥，還無償的給予男性充份的幸福感，甚至以其純真的本性，讓邪淫者自省、改變，到學會更珍惜身邊所愛的人，這種教育方式，用各種法門教化眾生的理念，翻轉了出禮教的型式化。「邪淫」在現代世俗的道德上不允許，禮運大同的世界，當然也不能同意，這時，金基德提出了這個「行善之城」的概念，用了援交天使這樣的一個角色，與援交為手段，反問我們所謂道德法則為何？當援交天使正在實踐她的理想時，法律、親情、家庭關係……在道德上絕對地不允許，然而金基德用了更誇示的劇情，藉以控訴道德的形式主義者，是否謀殺善行的元凶就是建構在禮教上的道德律，道德是否真的可以完全地普遍化、客觀化成為禮運大同的世界？

儒家的禮教，是種道德的絕對主義，經常被拿來與康德的普遍道德律會通，金基德的道德理念，會不會成了道德的相對主義？若用實例來說明，若在道德上吾人提出「是否可以自殺？」有一幕最衝擊每個人的觀眾的質疑，就是小和尚被情欲所縛，想自我了斷離開人間，被老和尚打了半死，而老和尚自己最後卻以自焚的型式離開世間。這一幕是金基德對道德型式最強烈的反動，對讀者提問的是「自我了斷」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對的行動嗎？他提出的這個情境是「這個自焚，是否可能是個理性的行動？」當然不是；但「這個自焚，是否是一個智慧的決定？」很顯然的，金基德留給這個行動一個無法用理解的畫面。

儒學的禮教，把忠君愛國，為守貞盡忠而捨身，允許為自殺的理由，然而在金基德是《春去春又來》情節中，讓讀者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老和尚「自焚」、「自殺」的行動，然而，反省一下我們成長過程受過的教育，自殺，建立在儒家道德上，守貞、死諫、寧死不屈，似乎我們的默默的接受了他的合理性，卻很少有反省過，為什麼儒家道德下，為忠貞而自殺的故事，不用被質疑而可以一直被推崇著？但佛教的生命最高成就—所做皆辦，功德圓滿，自化而離世，卻那麼不能被理解？這個對比，也是金基德對道德的一個挑戰。

「燃身供佛」，有其典故，《法華經》經云：

此香六鉢，價值娑婆世界，以供養佛。作是供養已，從三昧起，而自念自言：『我雖以神力供養於佛，不如以身供養。』……於日月淨明德佛前，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以神通力願而自燃身。……『善男子！是名第一之施，於諸施中，最尊最上，以法供養諸如來故』作是語已，而各默然。其身火燃千二百歲，過是已後，其身乃盡。

⁷ 《大正藏》第34冊，頁930上。



另外《佛遺教經》云：

世實危脆，無堅牢者，我今得滅，如除惡病。此是應捨之身，罪惡之物，假名為身，沒在老病生死大海；何有智者，得除滅之，如殺怨賊而不歡喜！汝等比丘，常當一心，勤求出道。一切世間動不動法，皆是敗壞不安之相。汝等且止，勿得復語。時將欲過，我欲滅度。是我最後之所教誨。

《八大人覺經》又說：「多欲為苦，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生死熾然，苦惱無量；發大乘心，普濟一切，願代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畢竟大樂。」生死輪迴是苦，如何善用此生之緣起，來莊嚴圓滿的生命，才是行者所考量的，對佛法來說，真正的自由，如何離開世間？如何處理此身？大智慧者自有定見。

大成就者可以選擇自己的方式，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學的，這個時代，若要以身供養，最好的途徑，就是把生命交出去，用春蠶到死絲方盡的決心來利益眾生，清淨的心念，無我的行動，就是大供養了，燃身供佛的作法，等待把《法華經》熟讀通透能理解後，再進一步討論才有意義，至於輕易地「自焚」、「自殺」而自比為殉道，則是不可取的大妄言。

三、金基德電影中的禪意

禪宗進入中國的過程，就是一個道德化的過程，道德化越深，就與儒學越相近，這點從《六祖壇經》的敦煌本，到宗寶本的增補文字中可以看出，宗寶本中有了「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這已經是很儒學化的文字了，而金基德的電影，可說是禪宗去道德化與印度禪的還原，或是儒家道德的解構。金基德這三部作品，都表現出禪宗實相無相，不立文字，佛傳妙心的手法，契嵩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贊》云「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⁸另外，《六祖壇經》又說「思量即是自化」，在正法眼藏，本是涅槃妙心，密說無首無尾，顯說有倫有義，在這個的脈絡下，思量自化即具「道德心」，「不思量性即空寂」即復歸無相法門的空性義，金基德的三部作品，就遊走在空寂與思量、顯說與密說之間，一體之兩面讓讀者任運自用。

禪宗無違於中國儒家的道德傳統，但也不死守於道德教條，因此多了一分彈性與方便。以《春去春又來》為例，小和尚與少女的愉情，在禮教社會絕對是不容許的，然而，若要說禮教道德有威權性，那守貞、禁慾，可說是儒家父權社會所建構

⁸ 大正 48，頁 346 上。



出的產物，但在這部電影中，金基德安排了這個甚妙的情節，表達禪宗對「性」與「慾」非常獨特的看法：少女為治病來到寺院，也服用了百草千藥，其中讓她療癒的一帖藥，竟是性解放，對愛徒與少女的「踰矩」，禪師並沒有搬出教條、戒律，反倒不否定治癒少女的病，「性」不失是一帖藥，但他對弟子仍有告誡，要小和尚觀照愛慾的實相，因不清淨，就種下一個惡因，果報就會是佔有、爭鬥、殺生……，禪師以此告誡弟子，完全不是談「性」的罪惡，而是「迷」與「沉淪」的因果。而「性」本身，在適當的因緣，亦不失是一門法。

任運自用的禪意，也表現在《春去春又來》一些小細節，一把充滿血跡的「刀」，本是用以殺妻，但在禪師的教法中，則要求徒弟用同一把刀，刻經、靜心，這把沾滿血跡刀，和尚又用來割除三千煩惱絲；再來，是警察入寺，和尚舉刀和警察對峙，刀，似乎成為為「毀滅性」之功能而存在的東西，終於，刀在和尚的手中，變成了刻心經的工具，每刻一劃，就消除一分的瞋念，成為成就心性的助緣，金基德企圖打破我們用分別心看待事物的成見，以物襯墊，企圖把觀眾導向「無分別心」意境，即是《六祖壇經》所言「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惡用即眾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一切法在覺者的方便妙用下，無不是利益眾生的渡河之舟。

《春去春又來》影片中，處處可見禪師展現出方便即是道用的智慧，本片中出現了相當多種的動物，包括蛇、魚、青蛙、雞、還有貓、烏龜，還有觀眾心較容易忽略的蝴蝶，在普遍的道德判斷中，魚、青蛙、雞是給人吃的，蛇是有害人，貓是玩賞用的，烏龜是寵物，蝴蝶，則是大自然中美麗的天使……，人類的判斷，決定了動物的命運。可是在成見未定的小和尚眼裏，動物雖不盡然是上述各種「用途」，這是導演用動物對道德律進行的第一層解構，但小和尚本能地自我中心，所以所有動物都難逃噩運，換言之，人類的普遍道德律是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基礎上建立的，但金基德藉此批判人的道德範疇，仍尚未普及到所有的動物，事實上，只要動物保護法中，還定義著「飼養動物」、「經濟動物」……，這樣的道德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質疑。

但在老和尚觀照中，動物不是盤中飧，是大自然的無盡藏，在老和尚的智慧裏，動物都可以得心應手地成為利益眾生的妙法，蛇和魚被小和尚凌虐而死，同一時間點，青蛙得到了解脫，是小和尚生命教育的第一課，也是一輩子必須面對的因果。貓尾，變成了是淨心的那隻毛筆，雞是在他快要沉溺時，把他從欲海中拉回來的繩，各種動物都教化小和尚的過程中，適時地出現，也在適時地離開，所有動物與老和尚同步教化，也伴著老和尚的智慧展現妙用，動物，即是小和尚不同階段的老師。金基德讓動物也成了方便妙用的法器，也是空寂思量之間的任運。

最有趣的一層挑戰，應是《春去春又來》最後給讀者留下的一個大問題，「蒙面



女是誰？」「是不是他的女人？」「小孩是不是他所生？」這些問題應當是全片導演佈下最大的疑團，讀者不可避免地會猜測，但不論如何猜測，都會有矛盾：若說蒙面女即是他的舊情人，但劇情不是已交代，當時他已殺死她而逃逸？若說蒙面女不是他的舊情人，那為何她要來找他，並把嬰孩留給他？為何他在為她蓋棉被時，她會主動伸手，貌似親密？……這些疑團，讓人怎麼想，都覺得不合理。

這個不合理性，正可看出金基德意圖對讀者打破一些道德框架。讓讀者自己觀照此心，事實上，每個人的閱讀，都有一些慣性，會在影片中找故事，會在事件中推測邏輯的合理性，但我們該注意的是，「理性」（reason）不過是認知世界慣用的一種機能與途徑，人們推測「合理性」（rationality）的同時，也應接受不合理存在的可能性。在這個疑團中，金基德似乎有意解構觀眾的這種思維，什麼思維呢？她是他的前妻，所以這男人對前妻帶有一份道義上的責任？他必須負責；嬰孩是他小孩，作為男孩親生父親，他沒有理由不帶著孩子長大？基於這份「親情」與「關係」，他應當出於責任救她們。另一方向的思考是，她並非他的前妻，這男人對她並沒有道義上的責任，他無須負責；嬰孩並不是他的小孩，他沒有義務帶孩子長大，彼此間沒有「親情」或「關係」，他有救她們的責任嗎？……在這些關係的反覆推敲中，我們漸漸看到自己被這種思維給框限住了，為什麼人總是慣於用「關係」決定「行動」呢（我應做什麼）？有親情則救助，無關係則置之不理，這就是道德嗎？金基德的解構，隱藏著一個大哉問，「存在相對的社會關係中所建立的倫理道德，背後的基礎是什麼？」還要猜蒙面女是誰？是誰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眼前所見，就是一個受難的人，面對她就是佛心，就是救，無需任何得失與價格之評估，也就是說，禪，若說有其道德性，也不能是被理性所框架的那種道德架構。

金基德把倫理關係解構了，純粹回到原初的那份心，用心去行動，即是禪。

四、結論：解構善惡二元的結構

（一）、因果觀

《春去春又來》一開場，小和尚的臉龐就散發著天真無邪的稚氣，但也在本能的趨使下，把小青蛙、小魚給綁上石頭取樂，老和尚告訴他，若有一隻魚死了，這塊石頭會壓在你心中一輩子，這不是老和尚的詛咒，而是老和尚對因果的告誡，真有因果？也許我們可以選擇不相信、刻意忽略、或輕意地把自己做過的事給遺忘掉了，但，沒有經過人生的體會，不會感受到因果的力量，因果貫通生生世世，這道理隨著小和尚的成長才體會到，兒時種過殺害小動物的因，一輩子的習氣與業力，讓小和尚承受一輩子貪嗔痴輪迴的果報，甚至無心中的鑿個冰洞洗臉，都會讓女子踩空落水而死，這就是人生存的荒謬與無奈。活著，先不要說要貢獻社會，光活下去，對環境就是一種壓迫，人所處的生存環境確是如此，食衣住行吃穿，無不是自



然界的負擔，小則環境污染，大則殺生造業，人活在種荒謬狀態中，當如之何？無動於衷、離開世界？還是有更重要的態度？懺悔、感恩、供養，應是讓生命有導向的實踐行動吧！懺悔什麼？懺悔自己的生存，對世間造成這麼大的傷害；感恩什麼？感恩這世上一切有緣無緣眾生，長養、成就我，讓我能因生命的存在得以生存、學習與創造，也因此而變得有意義；供養什麼？供養諸佛菩薩，也供養一切罪生，如此清淨的供養，就是生命最美的價值了。登上山頂這段路，也是人生的過程，有一股沉重的拉力，拉著每個人向下沉淪，但同時也有走向菩薩道的願力，讓人的生命有了導向，山頂之路，是懺悔，無始劫的業，是感恩，世間因緣的教導與成就，是供養，作為一個人，最清淨的一種行動，對佛菩薩與眾生，無條件地供養。

(二)、解構善惡二元對立的結構

貫穿三部影片的手法，就是對善惡二元對立的解構，善非善，惡非惡，在雙重否定中，讓讀者進入自性之善。三部影片都出現了警察這個角色，警察可說是法律具體化，金基德將之作為道德底限的象徵，他用了一些遊走法律、道德法則間的行為，把警察代表的硬道理解構了。《春去春又來》的警察，出現在寺院中，荷槍實彈，代表社會來行使正義，於是展開一場槍與刀的對抗，警與匪，槍與刀，善與惡，正與邪，這是二元對立的認知結構，但槍在不同的機緣，卻成了警察的玩具，刀反而成了刻心經，提升心性的方便道用，在禪師的眼中，警與匪都是未解脫的火宅之人，也象徵著，普遍法則也只是世間的善惡結構，並不能不是禪宗的解脫之境；而到《空屋情人》中的警察，金基德給這個角色更直接的嘲諷，是掛著正義之名的偽君子，死守法條，輕易定罪，警收賄，而匪奉獻，警刑囚，而匪救人，金基德把這個角色玩於鼓掌，到了《援交天使》給了警察一個人性與法律的拉扯之角色，除了對為違法非道德的援交行為，提供了一個純粹善的想像，也同時付予警察在嚴格執法，不通人情的情況下，反而成了間接的惡。

金基德在這個時期的作品，表現的風格，並非反道德，或去道德，而是對道德原則的再省思，去型式，去僵化，表現出禪風那種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宗風。本文希望藉由這樣的觀察，說明金基德電影不拘泥於道德原則的風格，也不受限於型式的束縛，為什麼是善？提供多幾分的彈性，為道德下了一個新的註解。



參考文獻：

邱察(2013)，〈金基德電影空屋情人中的後現代書寫與情境〉，《藝術研究學報》6卷2期。

李日章(2008)，《還原儒家 告別儒家》(台北：康德出版社)。



A Challenge to Confucian Moral Law from the Movies of

Ki-duk Kim

Tuan-Liang Chien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Abstract:

The three movies namely *Spring, Summer, Fall, Winter... and Spring*, *3-Iron*, and *Samaria*, directed by a Korean director (Ki-duk Kim) during 2003 to 2004, contain some unreasonable plots directly challenging Confucian moral law that has been deep rooted imperceptibly into our minds. For instance, in *Spring, Summer, Fall, Winter... and Spring*, we can see a young Buddhist monk making love with a young lady and an old monk burning himself. In *3-Iron*, the character breaks into other's houses while practicing good deeds, and steal other's wives. In *Samaria*, it talks about high school girl prostitution and lesbian love. Although the above movies portray human behaviors violating the ethics rules in our society, Kim aimed to open up our hearts and lead us to self-examination and self-awareness. Confucianists concluded some moral laws on our daily life and society, and thus built a social structure of manners; meanwhile, such laws are also regarded as externalism, and receive the criticism of manners as killing. Through Kim's three movie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challenge the moral laws in the Chinese culture, deconstruct moral principles of externalism, and reflect the meaning of the basic goodness of humanity.

Keywords:

Ki-duk Kim, Confucianists, Manners, General Education

